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09 年 03 月 (总第七期)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 2009. 03 —

E-mail: ias-fudan@fudan.edu.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433)

目 录

一、 三月学术工作	3
二、 学术出访.....	4
◇ 邓正来教授在“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国际研讨会”做基调讲演	
◇ 郭苏建教授出席并主持“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国际研讨会”	
◇ 郭苏建教授出席并主持“中美环境保护政策比较研讨会”	
三、 学术来访.....	5
◇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赵心树教授来访复旦高研院	
◇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政治学教授胡晓波博士来访复旦高研院	
◇ John H. Jackson 教授担任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 Joel K.Kassiola 教授来访复旦高研院并签署合作协议	
四、 刘清平教授加盟复旦高研院.....	8
五、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	9
六、 双周学术论坛: 中国深度研究.....	15
第十期: 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主讲关于 21 世纪上海的 10 个遐想	
第十一期: Joel K.Kassiola 教授主讲现代性的儒学化与儒学的“现代化”	
七、 中国与世界: 社会科学高级论坛.....	20
第八期: John H. Jackson 教授主讲“变化中的国际法制度、WTO 与中国”	
第九期: Stephan Feuchtwang 教授主讲“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	
八、 双周学术午餐会 (第二期)	24
九、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和未来发展: 青年学术沙龙 (第六期)	25
十、 媒体报道.....	28
《中国青年报》: “五条绳索捆绑 孩子如何成人”	
《解放日报》: “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遐想未来上海”	
十一、 附录.....	35
2009 年度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申报启事	

一. 三月学术工作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1. 学术出访：邓正来教授在“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国际研讨会”做基调讲演；郭苏建教授出席并主持“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国际研讨会”及“中美环境保护政策比较研讨会”；
2. 学术来访：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赵心树教授、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政治学教授胡晓波博士来访复旦高研院；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行为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Joel K.Kassiola 教授来访复旦高研院并签署合作协议；John H. Jackson 教授担任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3. 刘清平教授加盟复旦高研院；
4.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于 3 月 29 日在高研院“通业大讲堂”隆重举行；
5. “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举行第十期：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主讲关于 21 世纪上海的 10 个遐想；第十一期：Joel K.Kassiola 教授主讲现代性的儒学化与儒学的“现代化”；
6. “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举行第八期：John H. Jackson 教授主讲“变化中的国际法制度、WTO 与中国”；第九期：Stephan Feuchtwang 教授主讲“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
7. “双周学术午餐会”举行第二期；
8.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和未来发展：青年学术沙龙”举行第六期；
9. 相关媒体报道：《中国青年报》“五条绳索捆绑 孩子如何成人”；《解放日报》“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遐想未来上海”；
10. 2009 年度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申报启事。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9-03-31

二. 学术出访

邓正来教授在“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国际研讨会”做基调讲演

2009年3月28日，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由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北京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美国旧金山州大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祝上海师范大学校庆55周年“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国际研讨会”，并做题为“政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基调讲演。



郭苏建教授出席并主持“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国际研讨会”

2009年3月28日，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北京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美国旧金山州大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祝上海师范大学校庆55周年“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国际研讨会”，会议协办方代表郭苏建教授在“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国际研讨会”致辞，并主持和评论了主题为“社区治理与集体行动”的会议部分。



郭苏建教授出席并主持“中美环境保护政策比较研讨会”

“中美环境保护政策比较”研讨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于2009年3月24-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本次会议由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复旦大

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苏建博士参加并主持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自 1970 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以来，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环境问题尤为引人注目。环境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在发展中都共同面对的难题。前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中国的主题就是与中国领导人探讨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保护的合作。本次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中美两国学者在两天的时间里，以 30 多篇论文，在以下 8 个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中国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政策”、“美国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政策”、“中国的发展与环境对策：从历史到现在”、“都市的环境与对策”、“西部大开发：政策、产业与民族”、“中国西部的生态移民：个案调查与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和扶贫的政策与实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美两国代表有 40 余人。中国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河海大学，吉首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等 12 个单位，美国学者分别来自旧金山州立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学院的中美政策研究中心、人类学系、公共管理系、地理学系、环境研究项目等。



中美两国学者就美国西部大开发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以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环境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从城市化、工业化、定居化、荒漠化等多个角度，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中美两国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作用。

三. 学术来访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赵心树教授拜会邓正来教授

3月10日下午，国际知名学者、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赵心树教授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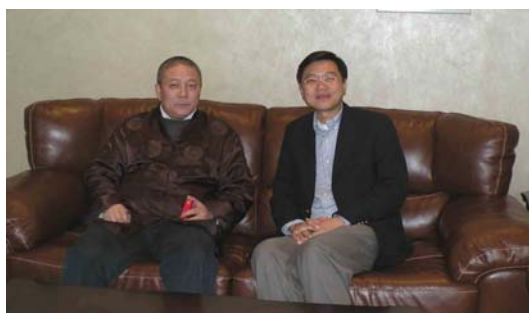


在复旦大学访问之际，专程来到高研院拜会了邓正来教授。在高研院2810室，宾主双方就当前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热点问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与走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就高研院与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学术合作等事宜交换了意见。

赵心树教授1955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并先后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1985）、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1989）。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兼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担任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还曾在1998至2000年间兼任美国公共电视网顾问。其研究授课的范围涉及哲学、政治学、政治传播、选举制度、商业广告、消费心理与行为、传播法律与伦理、实用统计等，尤其致力于选举制度和选举策略的研究，同时也在决策学、传播法律与道德、美国政治传播、广告效果、量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政治学教授胡晓波博士来访高研院



3月13日中午，政治学家、美国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中国研究中心胡晓波教授借回国访问之际，专程来到高研院访问并拜会了邓正来教授。双方就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外部发展条件和未来的走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就高研院与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学术合作等事宜交换了意见。高研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郭苏建博士会见时也参加了讨论。



胡晓波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师从龚祥瑞教授，后在杜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财产权、再分配政治（Redistributive Politics）、中国经济改革、中产阶级问题及中美关系问题等。出版有 China after Jiang、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Moving away from a Command Economy 等论著。

John H. Jackson 教授担任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3月17日，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和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邀请，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著名国际经济法教授、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院院长 John H. Jackson 教授来复旦大学访问和讲学。

下午3:00，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桑玉成教授，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张乃根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法学楼贵宾室会见了 John H. Jackson 教授夫妇。宾主就共同关注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WTO 的组织架构及其对区域性和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席间，邓正来院长代表高研院向 John H. Jackson 教授赠送了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纪念品。

3:30，John H. Jackson 教授担任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第八期讲演嘉宾，在报告厅做了题为“变化中的国际法制度、WTO 与中国”的主题讲演。讲演开始前，桑玉成教授代表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向 John H. Jackson 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的聘书。



Joel K.Kassiola 教授来访复旦高研院并签署合作协议

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邀请，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行为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 Joel K. Kassiola 先生于 3 月 26—27 日间来访高研院讲学和进行学术洽谈。



27 日晚间 6:30, Joel K. Kassiola 做客高研院“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在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通业大讲堂”进行了题为“现代性的儒学化与儒学的‘现代化’——21 世纪的中国发展与儒学绿色政治理论”的主题演讲。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博士担任论坛点评人。



讲演开始前，院长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与 Joel K. Kassiola 院长签署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行为科学学院学术合作协议。双方就以下三大方面达成合作备忘：（1）博士生培养和指导方面的经常性交流；（2）研究人员的学术交流；（3）暑期社会科学高级讲习班合作事宜。



四.刘清平教授加盟复旦高研院



刘清平，男，1956 年生，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文化比较、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美学。

1973 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5 年进入郑州大学学习，1981 年和 1999 年在武汉大学分别取得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93-1994 年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00-2001 年度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和联合神学研究院亚联董访问学者，2005-2006 年度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目前已出版学术论著、译著 6 部（含合著）；在《宗教伦理学》、《东西方哲学》、《亚洲哲学》、《当代中国思想》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英文学术论文 11 篇（包括 AHCI 学术期刊论文 6 篇），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新华文摘》、《孔子研究》、《宗教哲学》、《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中文学术论文、译文 110 余篇。

五.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



3月29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主办,Center for US-China Policy Studies、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协办的“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Roundtable: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在高研院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

来自复旦大学、University of St. Thomas, Würzburg University, Davidson College,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ennessee、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和《学术月刊》杂志社等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

邓正来教授代表论坛举办方致辞,他首先欢迎和感谢中外学者与会,感谢论坛协办方对会议筹备的大力支持。就本次会议的宗旨,邓教授指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政治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思考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第二、中国政治学本身取得了许多发展,政治学从西方学术理论中,从其他学科领域中获得了很多的启示。但是,如何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概念系统、分析框架乃至学派,甚至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将是中国政治学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中的重大问题。他希望本次论坛的与会者能够为推进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展开积极的理论的讨论。



本次论坛为期一天,上下午共四个单元,分别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的政治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与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分析方法与

中国地方政治”。上午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下午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政治研究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 Jon R. Taylor 教授认为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而非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应是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一种选择，应倡导一种（包括问题导向的研究和理论导向的研究在内的）混合方法的路径。德国维尔茨堡大学 Alpermann 教授认为西方政治科学研究具有多样性，并不存在同一化的西方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也应该多样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均应受到重视。戴维逊学院的 Shelley Rigger 教授指出，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多元化与其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分散有关，而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应该注意方法论“科学主义”霸权的倾向，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化进程；美国田纳西大学钟扬教授认为，与“政治学本土化”这一概念相比，用“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这一说法更恰当。政治学研究要在理论的框架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因果关系，最后再将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中国人民大学张小劲教授认为，三十年来，相对于其他学科，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处于很薄弱的层面，我们引进了很多的“主义”，但是这些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却显得有限，缺乏有实效意义的个案研究。复旦大学郭定平教授认为，基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等因素，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他分析了“现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对学生包括政治学研究者的负面影响，指出“想象力”、“解释力”和“创造力”对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性。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则指出，提高政治学群体的专业化程度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即转向问题的专门研究，系统掌握某一议题的专门知识，加强政治学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





研究与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大学贾庆国教授指出，中国政治学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理论和逻辑层面上的探究，而评价和反思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共识性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体系。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在发言指出，价值与事实的冲突，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常要面临的。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的发展路径以及现实经验与经典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冲突；其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所代表的经典理论之间的冲突。这种尖锐，既源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但同时也源于学术研究本身的认知误区。而关于价值中立问题，南京大学顾肃教授认为，尽管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政治学研究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价值中立。实现绝对价值中立的困难并不能一概抹杀相对价值中立的要求之必要性。即使从普遍的学术讨论的需要来看，至少是相对的价值中立才能建立共同的交流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则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已经发生结构性变革。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还用一些旧标签而看待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了的的中国政治。复旦大学陈周旺副教授认为，美国政治学学科化的主要力量，但对于技术手段的过分依赖，也导致美国政治学背离政治学固有的公共性和反思性，沦落为一种工具理性，中国政治学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当年片面追求量化的模式，中国的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必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

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政治发展，总结政治发展的“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政治学如何作为？同时他指出，有必要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作出具体的规划。与桑教授所指出“中国模式”直接相关，北京大学李强教授指出，对于中国的研究者与实践者而言，西方（民主）理论无法满足我们面临的（民主）转型需求。我们需要思考民主与中国传统是否可能有某种契合？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国传统中是否包含了某些虽不符合西方民主原则，却可能满足现代性政治需求的因素？北京大学谢庆奎教授则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是民主和自由；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是分权与制衡。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缺一不可。上海交通大学胡伟教授指出，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是经济驱动型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主要只是经济转型的副产品。着眼于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我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平衡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认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中国政治学是一个不断趋新求异、充满挑战的知识体系。政治学研究既要关注“问题”，也要注重“主义”。整合不同学科资源，有机拓展现有领域，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政治学分析方法与中国地方政治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的 Chenjie 教授认为,发轫于 1980 年代中期的中国民意调查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处于面临着诸多挑战的成长期,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民调的主题不断扩展和调查方法的成熟。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的 Tanqingshan 教授认为 1990 年代开始的中国村民选举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开始摆脱西方政治学理论模式支配并逐渐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标志,但他也对目前村民选举研究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如定量研究数据不准确、定性研究中所采用的个案不具代表性等)进行了检讨。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认为,在中国,只有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研究模式在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是以农民与国家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前提的。而当代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模式,既不是根本的对立,也不是简单的顺从,而是以其一系列的自主行为,希图改变国家的政策和行为模式。中国的政治学需要根据中国的经验来建构。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的发言集中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范式问题。他认为,受“现代化范式”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仍然表现出忽视自身发展经验对于形成中国公民社会品格的可能性研究,而且仍然假设了遵行西方路线的、从市场经济到公民社会到政治民主的演进路径。如何基于民间组织的经验发展获得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自我理解,是中国政治学要反思的。而就政治学的分析路径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商红日教授指出,我们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或许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形而上的套路,尽管研究方式有所变化。我们所寻找的事物很可能外在于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之中。浙江大学郎友兴教授指出,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政治的演变蕴涵着中国政治发展之走向。他提出“结构性情景下的构建”是分析中国地方政治变迁三十年的一个恰当的框架。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中国·复旦大学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China



本次论坛的举办时值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政治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素养和现实解释力。

本次论坛主题集中于反思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并对西方理论与中国政治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等诸项问题进行了争辩。会场气氛热烈，对论题的讨论具体而深入，主题发言人同与会人员及听众之间的往复论辩既契合于特定单元的主题，同时又直接深入到与此论题直接相关的，也是更为基本的政治理论研究层面。有效地呼应了整个论坛的主题。既开放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同时也为相关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做了若干程度上的推进。



六．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

第十期：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主讲关于 21 世纪上海的 10 个遐想



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系教授、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主编 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于 3 月 12 日来高研院进行访问和讲演。

下午 1:30，在高研院“思想者学苑”，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接受了多家上海媒体及其他驻沪媒体的采访。采访中 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就媒体所关注的 2010 年世博会对上海发展的国际意义、全球化背景中的上海与世界的关系、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与其他城市的区别等等问题回答了在场记者的提问。



访谈结束后，应高研院邀请，在高研院“通业大讲堂”，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发表了题为“关于 21 世纪上海的 10 个遐想”（Ten Theses on 21st Century Shanghai: Thoughts on History and Comparison）的主题演讲。本期讲演系“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第十期，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李天纲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邓建国博士应邀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出席论坛。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论坛。他首先介绍了高研院两大常规性学术论坛（“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与“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的创办主旨和活动概况，介绍了出席论坛的讲演嘉宾 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和评论嘉宾李天纲教授和邓建国博士。



讲演中，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指出，他愿意对上海的未来做出 10 个畅想并愿意就其中的问题与大家展开讨论。这些畅想游走于上海的未来、现在和未来之间，以期有助于我们对上海明天的思考和建设。

接着，他分析了自己对上海未来的 10 个构想。第一，上海 2010 世博会将很重要，上海世博会将成为国际媒体详细报道的焦点，同时，由于世博盛会将在黄浦江两岸同时展开，它将使得浦东和浦西更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第二，上海的 2010 世博机遇已经来临，浦东和浦西之间联系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物资条件的



准备，磁悬浮线的设立，这些与其说是为举办世博而准备的，不如说是世博会举办后留下来的“遗产”；第三，将上海视为“东西交汇之地”已经过时了，上海已经进入了一个再全球化时代；第四，历史曾经影响并且将持续影响上海的突飞猛进；第五，上海作为通商港的历史并非是将继续塑造其未来的唯一因素；第六，上海是独特的，但又不尽如此，上海是多面的，在世界城市之林中独一无二，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接着与世界其他城市做了比较；第七，21 世纪上海与世界其他“再全球化”城市有着共同点，如伊斯坦布尔和上海一样处于相似的上升轨道上，上海有着“东方巴黎”的别称的城市，印度的孟买开始学习上海等等；第八，21 世纪上海正经历后社会主义都市阶段；第九，21 世纪上海是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第十，21 世纪上海仍然是独特的——因为她融各种特点于一身。上海，如同从前一样，再一次成为一个“仅此一个、别无同类”的城市，融合了感官享乐和华丽壮观、过度开发和激动人心。

讲演之后，李天纲教授首先对 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的讲演进行了点评。他指出，第一，Jeffrey 的外部性视角为我们发现上海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上海人太过熟悉上海而可能会遮蔽对这些问题的敏感性；第二，Jeffrey 教授对上海的定位——“作为未来的上海”很有启示意义。这为我们开放对上海的想像

提供了坐标；第三，通过北京奥运会的理论分析，Jeffrey 教授指出世博会所具有的“合作”意味将对上海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邓建国博士在点评中指出。他认为：第一，不同形态的“全球化”对我们今天理解和解释上海的去、现在和未来具有不同的启示意义；对上海来说，“再全球化”就是维持国际性的开放之都。从这个意义上对比曼谷、纽约等城市，讲上海作为“未来之都”很有意思。第二，从空间分析，（文化、经济上等方而的）东西交汇与东东交汇对我们认识上海也很有启示意义，而这与北京奥运会强调体质上的竞争不同，世博会为全方位展现东西文化提供了平台，而这本身也是上海迈向全球化的一个极好契机。



讲演之后，在场听众针对本次讲演纷纷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看法，如上海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差别；世博会与上海的未来；“充满未来感”的上海如何让世界了解等等。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不仅认真回答了大家的问题，而且也就一些不同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论坛适值上海世博会进入最后一年准备期，并且将展开全面宣传之时，因此吸引了大批的听众和新闻媒体前来参与。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从一种内/外部视角相结合的路径对上海发展的国际环境和自身独特的地缘和历史优势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并开放出了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十一期：Joel K.Kassiola 教授主讲现代性的儒学化与儒学的“现代化”

3月27日下午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十一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行为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Joel K. Kassiola先生作为论坛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博士担任论坛点评人。复旦大



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首先，邓正来教授介绍了讲演嘉宾 Joel K. Kassiola 教授，论坛点评人郭苏建教授和刘建军教授，及高研院新引进的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接下来，Kassiola 教授做了题为“现代性的儒学化与儒学的‘现代化’——21 世纪的中国发展与儒学绿色政治理论”(Confucianizing Modernity and “Modernizing” Confucianism: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Confucian, Green Political Theory)的演讲。

首先，Joel K. Kassiola 教授陈述了他的核心观点，即环境和政治理论交叉研究的基本观点在于人类的各种价值和政治行为是环境危机的根源。他所倡导的绿色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环境危机并不像大多数人界定的那样，是一个技术或科学领域的危机。环境危机根源于价值危机。因此，环境危机必然且不可避免地是政治危机，而不是技术危机，也不是科学危机。



在 Kassiola 教授看来，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西方现代性中的各种工业化社会价值，包括物质主义、竞争、不平等、个人主义、追逐特权和经济无止境增长，西方各国将驱动经济无止境增长的个人主义和物质消费视为现代化的原动力，而儒学更为强调集体价值和努力，将其视为追寻现代化的灵感。我们不仅必须实现“现代性的儒学化”，而且必须实现“儒学的当代化”，设法合成儒学和绿色政治理论。面对全球环境危机，通过儒学的当代化和运用我们关于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威胁的环境知识来更新儒学，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一个在符合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角色楷模。

最后，面对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Kassiola 教授提议追寻中国的伟大传统，设法在儒家道德价值和思想基础上建构中国发展模式，倡导运用儒家智慧从事现代性的变革，并进行儒学的当代化。创建儒学绿色政治理论，重建中国，改善其生态环境，为其公民创建一种更为公正的和具有可持续意义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儒学绿色政治理论可能带来第一个真正具有积极内容的“后现代”社会。



讲演之后，郭苏建教授首先做了点评。他指出，许多人认为是依靠科技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等，可以解决世界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其实不然，Kassiola 教授认为是社会价值观念所导致的生活方式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倡导非

西方的，放弃西方资本主义物质、个人及消费的西方现代性观念，主张中国现代性的儒学化以及儒学的“现代化”，设法将儒学观念与绿色政治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最后，郭教授提出一点疑虑，即 Kassiola 教授可能忽视了儒学价值对政治的负面影响。

刘建军教授接着做了点评。他首先指出了自己对现在全球环境恶化的深切体会，特别是中国在近些年来，追求发展的同时，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刘教授指出，Kassiola 教授的绿色政治理论突破了传统政治理论一向讨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藩篱。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推向了理论的层面，将这种新的社会运动进行了理论构建。他提出，Kassiola 教授将精神资源和制度资源的儒学又当做是理论资源加以探讨，进行了理论的重建。最后，他提出自己的一个问题，即 Kassiola 教授讲演一直未提及西方宗教，只是把儒学作为解决问题唯一的替代品，而儒学可能只能解决中国问题，对其他国家可能并不适用，要强调理论的多样性。



点评之后，在场听众针对讲演内容，纷纷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向 Kassiola 教授提出了各自的疑惑。如孔子的儒家学说有其固有的缺陷，是否应完全采纳；面对当今全球资源匮乏，怎么处理资源紧缺问题；在当今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上，普通市民和政府所担当的角色问题等等。Kassiola 教授给予了耐心的回答和解释。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论坛总结。他指出，首先，Kassiola 教授的绿色思想，打破了启蒙时代建立的人类中心论。但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是，当选择任何一个对象想要和它建立一种和谐关系的时候，还是存在着主客体之间的支配关系，而这种关系捍卫着的依旧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么能否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这是需要进行思考的；第二，Kassiola 教授试图从儒学中找资源，进行知识和理论的重新解释和构建。但知识和价值是否可以超越时空，具有特定时空的限定；第三，面对知识时空性的问题，就出现了知识的地方性问题，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地方性与普遍主义之间的关系？

本次论坛，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Kassiola 教授阐述了自己的绿色政治理论，强调环境的恶化并不是科技问题、资本问题而是由社会价值观念导致的生活方式问题。因此，应该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解决问题，抛弃西方资本主义物质、个人及消费的现代性观念。他的绿色政治理论，提倡现代性的儒学化和儒学的“现代化”让在场听众耳目一新，也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资源的现代意义的追寻。

七. 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

第八期：John H. Jackson 教授主讲“变化中的国际法制度、WTO 与中国”



3月17日下午3:3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第八场主题讲座。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 著名国际经济法教授、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

院院长 John H. Jackson 教授担任主讲嘉宾。本次讲座由高研院与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合作举办。

讲演由邓正来教授主持。他首先感谢 John H. Jackson 教授来复旦大学讲学, 向听众介绍了点评嘉宾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赵龙跃博士, 复旦大学法学院张乃根教授, 以及主席台就坐的校长助理桑玉成教授和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



讲演前, 桑玉成教授代表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向 John H. Jackson 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的聘书。



接着, Jackson 教授做了题为“变化中的国际法制度、WTO 与中国”(Changing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WTO and China)的主题讲演。第一, 他分析了现在世界问题的性质, 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和推进, 世界出现了许多变化, 如科技上的改变: 交通运输上的革新和电子沟通方面的技术发明, 使得世界各地方的联系紧密方便。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方面, 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监控, 呼吁政策和制度的革新;

第二, 他探讨了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和性质, 解释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由此建立了“主权模型”(Sovereignty Model)的概念; 第三, 从全局的观点来看国际法制度, 讨论了怎样通过具体条款来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遇到的问题; 第四, 详细分析了 WTO 组织规则在政治、经济谈判上的作用。

Jackson 教授讲演之后，张乃根教授首先做了点评。他指出，Jackson 教授的讲演体现出三维的视角，即经济上、政治上及法律上的。那么，怎样用这三维的视角去诠释当今世界的诸种变化，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这牵涉到我们怎样去真正理解 Jackson 教授，理解 Jackson 教授理论背后的问题关注？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赵龙跃教授接着做了点评。他结合 Jackson 教授讲演中提到的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制度的关系，简要介绍了 Jackson 教授 2006 年的著作 *Sovereignty, the WTO and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Law*，推荐在场学生阅读原著来更好地理解 Jackson 教授。

点评之后，在场学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和存在的疑惑进行了现场提问。如 WTO 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所起的作用，WTO 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意义，国际法制度本身的性质，等等。Jackson 教授一一做了耐心的解答。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总结。就今天的讲演，他指出，关键的一点在于 Jackson 教授乃是基于“全球化”来讨论变化中的国际法制度的，那么，如果“全球化”本身不是一个正确的或可欲的发展方向，我们将如何思考一种国际间的组织架构，我们将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思维方式？



本次讲演 Jackson 教授从全球化问题入手，分析了国际法制度的性质和作用，进而对 WTO 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向在场听众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他对中国的关注，使得在场学生对国际法理论和 WTO 组织架构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第九期：Stephan Feuchtwang 教授主讲“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



3 月 30 日下午 2: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 103 报告厅举行第九场主题讲座。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著名人类学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担任主讲

嘉宾。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乐天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常向群博士应邀担任评论嘉宾。

讲演由邓正来教授主持。他首先感谢王斯福教授来复旦大学讲学，并简要介绍了王斯福教授的学术背景及其与中国学术界的紧密联系，介绍了点评嘉宾张乐天教授和常向群博士。

讲演前，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向王斯福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的聘书，王斯福教授向高研院赠送了他的学术著作。



接着，王斯福教授做了题为“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of China）的主题讲演。王教授首先从他的中国同行王铭铭教授的“三圈说”研究讲起。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圈说”概念，即中间圈是地方性研究，或对大民族的研究；第二圈则是对于中国非汉民族的研究；第三圈指的是中国学者对国外的研究。王斯福教授指出这是从中国的文明中心出发所得出的现代版本的“三圈”说。而他认为，这个中间圈实际上应该有两个中心，一个是遥远的中心，一个是当地的中心。当地的中心在经济文化及政治上与遥远的中心有一定距离。但它们仍可视作为中国范围内的某种地域性。核心圈不仅仅指的是当地这个中心，同时指的是该地区与中央这个中心的经济政治和文明的力量等级。



王教授以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为例，解释了人类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所遵奉的学科使命，即详细说明、并分析和阐释他的研究对象的观点。人类学家的任务是通过当地人对自身的理解来查看、检验并修正自己的理论和假设。由此他分析了人类学大师马塞尔·毛斯、萨林斯关于人类学中“文明”的概念的不同解释，

分析了杜蒙(Dumont)通过“平等”和“阶序”的分析而提出的对“文明”理解的扩展。

王斯福教授最后指出，中华文化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它是许多文化和社会改革累积形成的。他指出了其间发生的几次重要变化，一是帝国作为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主要制度载体。二是选官制度的变革对后世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

王斯福教授讲演之后，张乐天教授首先做了点评。他指出，王斯福教授的讲演为我们理解“文明”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差序”的视角。通过王教授的讲演使我们看到，基于立足点的不同看到的文明的中心也是不同的；而这也说明，“文明”本身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没有等级分别；文明是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而这其中所发生（文明）的结构转型和（人们的）学习、传播方式对我们增进关于中国文明的理解的巨大启示意义。



常向群博士接着做了点评。她首先追述了王斯福教授关于英国汉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重点阐述了英国学界的汉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同时她分析（诸如王斯福等）域外学者关于中国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所内涵的人类学学者“异质”文明研究的限度与优势。

讲演和评论结束之后，在场的学者和学生纷纷发言，表达了他们对王斯福教授所涉论题的意见。如，理论上认识文明问题的意义，尤其是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对我们重构中国文明的重要意义，“异质”文明研究与研究者自身的关系；研究者中具体区域研究与研究本身所需要的整体性视角之间的关系；文明的传统及其现代转换，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论坛总结。他指出王斯福教授的讲演极富理论意义，其中隐含着很多需要进一步开放思考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尤其是概念因其本身所具有的高度概括性和简约性可能会舍弃或裁剪很多细节。这就提示我们要注意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与理论研究之间可能有的某种紧张。

本期讲演内容关涉文明与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对我们理解异质文明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意义。王斯福教授以一名外国人类学家的视角，为听众展示了他理解文明与文化的理解和解释。

八. 双周学术午餐会（第二期）

3月10日中午12: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高研院“思想者学苑”举行第二期双周学术午餐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俞振伟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副教授、沈国麟博士应邀参加学术午餐会。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博士主持本次学术午餐会。



主讲人俞振伟教授以“大众时代的文化传媒”为题，他提出，第一，现在是大众传媒驱动的时代；第二，大众媒体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文化“均贫富”的可能。如盗版碟片现象的出现；第三，要提升中国媒体的道德素养与责任意识。

接着，大家就全球化与媒体发展，新闻娱乐化，“大众时代”的概念，中西媒体对比等话题进行了探讨。曹晋副教授指出，新闻娱乐化、媒体娱乐化在很大意义上是由市场效应所促动的。沈国麟博士则分析了大众时代已经是一个已然成就的事实。郭苏建教授则提出了文化传媒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问题；邓正来教授以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大众时代”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时代，它的内在特征是什么？他通过儿童对成年人行为的模仿这一事例指出了这里面所隐含的为人们所不意识的问题；陈润华博士则通过古今对比的方式质疑了时下流行的媒体运作逻辑；王勇博士则认为，从“大众时代”的传媒背后所隐含的支配结构而言，真正的“大众时代”还没有到来，以各种方式所展现出来的“精英”话语力量在实际上支配、主导或宰制着时下的文化传媒的基调和走向，而在这种主动或被动关系中，个体人的主动性或主体性被消解或边缘了。



学术午餐会系高研院内部学术交流活动。每双周举办一次，每次邀请不同学科的三位嘉宾，其中一名为主讲嘉宾。主讲嘉宾在餐前就某一特定主题发表演说，用餐时另两位嘉宾以及高研院所有研究人员对主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

学术午餐会旨在轻松的环境下，就同一话题，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加以思考讨论，推进高研院学术研究，促进跨学科同行间的交流。



九.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和未来发展：青年学术沙龙（第六期）

3月18日下午2:30，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青年学术沙龙”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六期讨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周旺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方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郝娜应邀担任主讲嘉宾。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应邀担任点评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出席沙龙。

邓正来教授主持本次学术沙龙，他首先介绍了出席沙龙的演讲嘉宾任晓教授、陈周旺副教授、方钦博士和博士研究生郝娜，为他们颁发了高研院青年学术沙龙演讲嘉宾聘书，并向他们赠送了高研院图书。



首先，任晓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学派’之争”的报告。他指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立基于打破学术研究分界，贯通学科划分所推出的各项举措很有意义。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分工越来越细，但同行交流起来都很困难的研究取向，不利于学术视野的扩展和问题的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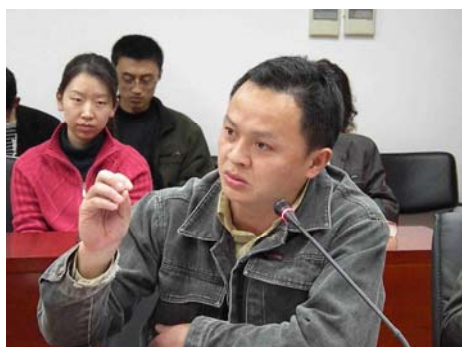
决。任教授以建构国际关系领域的“中国学派”为例说明，中国社会科学晚近的发展从“引进”、“翻译”到“介绍”，都没有脱离西方理论示范的藩篱。而建构中国学派需要确立我们学术研究的“自我意识”，寻求“中国特性”。

陈周旺副教授的主讲题目为“从美国政治学的创建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他以梳理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为切入点，从学科建制、研究方法、基本论题等方面对美国政治学的发展轨迹进行了阐释，并着重分析了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三大动力（“本土化进程”、“民主改革运动”和“学科化努力”）。他阐述了确立学者自身的自我反思意识和形成问题性焦虑对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启发意义。



方钦博士的论题为“从霍布斯到莫斯——演化博弈视角下的财产权观念解析”。他通过博弈理论分析，并结合产权理论发展脉络，简要分析了西方财产权的流变。同时他对比中国古代社会对物的管控方式，分析了中西方不同的物货流转方式及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郝娜的讲演以“同一个群体的两张面孔”为题目。她对比分析了中国学研究领域杜赞奇与黄宗智理论建构的分野，并指出二者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不同态度，从而引申出了她所关注的问题——如何形成关于中国社会的独特解释理论，并使之契合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在。



四位嘉宾的报告结束后，在场听众对他们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纷纷提出问题。如“中国学派”问题的提出是否与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增长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建立“中国学派”的前提性条件有哪些；学术自主性问题与知识增长的之间内在关系如何；黄宗智理论研究中的历史指向及其概念建构；“国家-社会”框架的解释力，等等。

任远教授对今天的讨论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创建“中国学派”或学术研究“中国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在面对西方理论示范时的一种挣扎境况。而任何一种学术意图都不是有了问题意识或有了基本的思想之后就能够自然

达成的。形成一种全新的理论学派的前提在于一整套基本概念，逻辑体系等的构建，我们在反思/批判现有学术理论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是不是我们的审读视角也存在某种倾向性。



会场讨论气氛热烈，四位嘉宾的讲演论题不约而同地关涉“中西之争”。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中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便始终以不同的方式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和讨论。本期沙龙为我们深入追究此类问题开放出了继续思考的空间。

十. 媒体报道

《中国青年报》：“五条绳索捆绑 孩子如何成人”

中国青年报 2009-03-06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3/06/content_2567836.htm

“今天，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还在做奴隶？我们的教师是不是还在跪着教书？”

台上，一位高中语文老师提出问题。台下，大学生、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在认真聆听。整间教室里没有一个空座，挨着墙壁的一圈人或站或坐，门口还不断有人挤入，在人群缝隙里探出半个身子。几个身穿高中校服的学生快速从后门跑到第一排，在座椅之间的走道上找好位置，挨个坐到地上。

这是复旦大学近日举办的一场讲座的盛况，讲座题目是严肃的：《人是怎么不见的——上海高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讲座由高研院院长邓正来主持，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和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参加点评。

演讲的主角黄玉峰则是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演讲开始前，他刚刚从邓正来手中接过了高研院兼职教授的聘书。

邓正来介绍，中国社会的深度研究中一直忽略了中小学教育，研究人员很少与学生、家长以及基础教育体制直接打交道。他说，“这很可能是高等院校，第一次邀请一位中学老师做兼职教授。”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快乐幸福，却给人带来痛苦

“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校长，没有哪一个教师说教育不要以人为本，也没有哪一个家长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但实际上怎么样呢？”山西一所中学教师郝

旭东被学生杀害；因为考分压力大孩子弑母……黄玉峰经常看到类似的事件：“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

黄玉峰一直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人自由地生长，让人性升华，让人快乐幸福。但许多事实反映出教育给人带来痛苦，他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

在他看来，有五条绳索捆绑在孩子身上，使“人”消失了。

“首先是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黄玉峰总结了功利主义的两个方面。过去是政治挂帅，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着眼点在于人是机器，是螺丝钉，这是一种国家功利主义；后来是分数挂帅，一切看分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成了分数的奴隶。“进入高校以后人们又成了考证书的奴隶，这是一种个人功利主义。”

黄玉峰提到6岁的窦蔻出书事件，当时许多媒体在宣传一个概念：“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上。”他写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定输赢》来反驳，“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国家讲人要做螺丝钉，但人人又不愿意做小螺丝钉，所以竞争很激烈。”他分析，功利主义是从上到下的：“教师要服从校长，校长要服从教育局长，局长要服从顶头上司，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名誉的、地位的这些功利主义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一天一天让他们痛苦起来，从小就有巨大的精神压力。每天很多孩子在厌学，甚至用伤害教师的方式来反抗。”

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功利主义通过应试教育实现，如今应试教育究竟怎么回事？”黄玉峰举了一个例子：考试中，学生富有灵气的回答因为不符合标准答案，“最好的能得及格分，稍差的统统不及格。”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专制主义：“高考指挥棒训练人揣摩出题人的意图，长久训练以后，明知这样答不对，但学生仍要去迎合，这样人格分裂对学生危害很大。”

黄玉峰认为，专制主义的教育造成许多缺失，包括同情心、独立精神、自己的想法等等。“学生从小时候起就学得很苦，但到了高中以后还是‘空如洗’，所以复旦大学要搞通识教育。其实很多书都应该在初中、高中就看，应该做的都没做，学生们都被习题占有了。”

再一条是猖獗的训练主义。专制主义通过训练实现：“要很快达到目的，实际上搞的是教育大跃进。”黄玉峰看《学记》里讲“学不躐等”，意为教育不应该超越当时的阶段，但现在的教育是反其道而行之。

黄玉峰认为，高中最要紧的是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包括汉语的认字、识字系统，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和母语文化认识系统。“现在语文课教成外语课，外语课有语法，语文课也变成语法课。其实语法是外加上去的，它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意见。”

黄玉峰认为，最糟糕的是，人们常常把意见等同于知识，“考题出得再好，判断对错，也是一种个人的意见。知识像历史朝代，是不能动的。知识和能力有区别，但知识总是要掌握的。”

黄玉峰曾经教过苏步青的孙女，他还记得家访时苏步青的意见：“要宣传一下，小朋友一二年级的时候，数学不要学得这么深，玩玩就可以了。到了一定年纪，随便讲一讲就通了。这个时期为什么不让他们背点经典？”黄玉峰感叹：“训练主义害了很多，使得我们没有思想，还谈什么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最后两条绳索是盛行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是理论层面，后者则是操作层面。“与其说教育是科学，还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因为对象是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而科学是验证的，某种条件不变的。”黄玉峰提到教师考评不合理的标准：上课时提了几个问题，师生互动怎么样，PPT用得怎么样等等，“完全是死的步骤，最好讲完后下课铃刚好响起。”还有的要求发表论文：“不管文章是豆腐块或者豆皮，只要发表了就行。”这样“科学”地考量后，教师评上级，报纸还要宣传，“这是把人看成了机器”。

黄玉峰对英国教育学家怀德海的话深有感触：“中学阶段应该伏案学习，大学再站起来，四面瞭望。”他很遗憾，“现在学生在大学里还不得不继续伏下去。”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胜 以应试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败

面对基础教育的困境，很多人说没办法。多年的实践，黄玉峰探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大环境不变，我们有小环境。教室门一关，我可以说我要说的话，做我要做的事。”

语文课本发下来，“薄薄的”，于是黄玉峰就自己增加文本。有些课文，学生看看就懂，他就不讲，“有的读一遍，有的要一句一句讲”，把文本细分开来。另外，还抓学生的泛读和精读，班级出刊物进行交流。有机会就搞文化集训，每年总要有两次，持续天数不等：“听听学者们的声音，让大家震撼一下。”

黄玉峰带学生出去，“看到景点讲景点，看到匾额讲匾额，看到碑文讲碑文，看到碑上有错别字我们找出来。”到后来，不带标点的文言碑文，学生自己就能读下来。

“总之可以做点事情。”黄玉峰想，通过这样的一些教育，现状能够有所改变。他总结了两句话：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胜；以应试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败。“水平真正提高了以后，学生对应试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这次高校自主招生，黄玉峰教的班上有十多个学生分别通过了复旦和交大的面试。加上一些学生出国，剩下的部分学生，黄玉峰认为他们“考一考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的实质是时间争夺战

黄玉峰演讲完后，几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教育的弊端究竟是什么？人们常概括为应试教育。而王德峰认为：“应试教育并不可怕，问题是今天的应试教育占据、剥夺了中小学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问题的实质是时间争夺战。”

王德峰假设了一种情形：学生用半天时间“就像在一个工厂里边，被无情地训练。这也是锻炼意志嘛，然后把另外半天还给他们”。这半天也许在弄堂里打架，在看文学作品，或者跟着黄玉峰讨论李白、杜甫，也可能做家务，去学工学农，“这就有健康成长的可能”。

“黄老师讲的五个主义中间，第一个功利主义是根源，其他四个主义是从这个根源中产生出来的桎梏。”王德峰认为，根本上解决中国教育制度困境的前提是成人社会的转变，“教育的制度安排和它的现状，是整个民族成人社会的一个缩影。”功利主义把基础教育变相地、隐形地产业化，导致学校之间类似于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什么上海高中的‘四大名校’在一个隐形的基础教育市场上地位牢固呢？因为家长需要，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没从‘四大名校’毕业。家长是个成

人社会主体，成人社会是社会主体，教育的功利主义来自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王德峰略显激动地说。

骆玉明提到，有媒体邀他写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他回答：“教育这个东西，可谈的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都不可谈。”这是因为“教育问题是一个整体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问题”。他感觉到，“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紧张，人们的警惕心越来越强，似乎从老师身上谋取利益、获得机会的学生多了。”

邓正来则提出了教育制度的共谋结构问题：“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决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但我们不知不觉地会说是教育的问题，像应试的问题、高考的问题等等。我们不要忘掉，作为学生，在这里面干了什么；作为家长，在这里面干了什么；作为教师，在里面干了什么；作为社会一员，我们干了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共谋的结构。我们都在帮这个结构做一件事情，我们撇不清了。”

为什么撇不清？邓正来说：“因为我们的利益在里面，有我们亲人的利益在里面，有其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在里面。这么深的一个共谋结构，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另外还有一点要反思，“我们都深陷于这个共谋结构之中，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去做出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的改进？”

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遐想未来上海

《解放日报》2009-03-22 08版：思想者

http://epaper.jfdaily.com/jfdaily/html/2009-03/22/content_205981.htm

正如科幻大师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名言：“未来已经来临——只不过它的分布不均匀而已。”在21世纪开始时，上海再一次站在了城市发展的前沿。她打开了一扇朝向亚洲世纪的窗，沐浴在国际遐想的光芒中。

2000年以来的几年，上海仍然遵循了以前的模式。这是一种发生在建筑环境和本地生活质量上的快速的、常常令人迷惑的变革模式。由于这个城市的变化速度实在太快，那些希望向读者描述这个大都市当下究竟是何模样的作家们常常面临着一个挑战：他们担心，当然是很有理由地担心，自己的构思尚未完成，而这个城市建筑又要发生新的变化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对上海的未来作出一些畅想。这些畅想游走于上海的过去与现在之间，以期有助于我们对她的明天进行思考。这些畅想的灵感来自于我对上海历史的感受，并且是建立在我对上海历史的研究以及我几次访问上海的所见所闻之上的。

2010年世博机遇已经来临

基本到2008年，上海就已充分具备了举办世博的物质条件。这些条件与其说是为举办世博而准备的，不如说是世博会举办后将留下来的“遗产”。

在西方，世博会的功能已部分被主题公园所取代，如美国奥兰多的爱普卡中心（Epcot Center）就为各国设立了独立的场馆。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地为超级购物中心（Mega-malls）所取代。在这样的购物中心内，世界各国的产品和食品都可以买到、尝到。

而在亚洲，情况则非常不同。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报纸、网站不断报道有新的国家签署协议同意设立国家馆。在上海，关于过去世博会曾经带来的以及本届世博会即将带来的影响的书籍或文章不断

出版，并受到热情关注。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媒体肯定将进一步报道这部“上海连续剧”的筹备工作。

除此之外，由于根据预测上海世博会将吸引 7000 万游客光临上海，上海世博会将成为国际媒体详细报道的焦点。尽管，由于世博会并不是专为电视转播而设计的，可能不能吸引到像奥运会那么多的国际观众，但如果正如预期中那样，前来上海参观的游客将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其他地方、香港、台湾以及中国的邻近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那么在吸引西方媒体的报道量上，上海世博最终仍可能做到与北京奥运会等量齐观。

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早已开始精心设计并采取各种措施，以引导世界将目光投向上海世博会。例如，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的主网站就设立了有关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栏目，而上海世博会的本地推动者则常常以“经济奥林匹克运动会”来喻称即将开幕的世博会。在上海，世博会将带来的地理上的重要象征意义已被充分提及：由于世博盛会将在黄浦江两岸同时展开，它将使得浦东和浦西更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无疑，上海世博会将巨大地改变上海的建筑环境和国际形象。对此，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世博会将在未来数月里为上海带来什么，也要同时充分认识到世博会已经为上海带来了什么，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内各区域之间从物流到交流的加强，包括管理和经营这个城市的理念，等等。

尽管，目前上海尚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感受到 2010 世博会的震撼力，但上海城市规划馆内的展示却已是变了又变、精彩迭出。在那里，参观者可以看到上海的城市模型，其尺寸之大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一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要再花一两年、有的还要花十多年才能真正完工的工程。但基本到 2008 年，上海就已充分具备了举办世博的物质条件。这些条件与其说是为举办世博而准备的，不如说是世博会举办后将留下来的“遗产”。

从“东西融会”到“再全球化”

今日上海再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正讲述着一个“再全球化”的故事，而且可以说明其“再全球化”特征的“单子”可以列得很长。

昔日的上海，曾经只是一个以渔业和棉纺织手工业为营的小镇。后来如何成长为一个东西方交汇之都？要追踪这种说法的来源并不难。

19 世纪，上海由于良好的地理位置开始展露锋芒。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通商的口岸之一，并很快因成为东西方贸易交流的中心之一而迅速发展。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成为跨国公司开展贸易和商务的枢纽，是亚太地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上海成为众多西方名人拜访中国旅程中的一站，以及西方商品，从街灯到小汽车，从可口可乐、香烟到萨克斯管、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的港口。

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上海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她常常是那个他们了解西方的主要窗口；而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她是了解中国的一个主要窗口。然而，同样值得深思的是，上海也许曾是“东方巴黎”或是“西部的纽约”（上海又一个外号；纽约在美国东北部，所以称上海为“西部的纽约”——译者注），但她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和美国商品、思想和人员抵达中国后，在这片广袤而古老的土地上留下其印迹的地方。在这里，一直都有“非纯粹西方”和“非纯粹中国”的演员。他们在上海的全球化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在上海，来自韩国的商人或来自巴格达的犹太人家庭，经常会去欣赏上海市府铜管乐队的表演，而乐手中又有菲律宾人。在他们进入音乐厅时，来自印度

的巡警则正好从门口走过。在上海最初忝列全球都市行列的时代，包括来自日本的参与者，或作为投资者，或作为游客、文学作家、文化实业经营者等，也对上海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但如果说以上种种例证见证了上海最初的“全球化”的话，那么今日的上海则再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正讲述着一个“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的故事：外国公司参与到上海不少地标建筑的建设中；浦西有很多配置了大型数字电视的卡拉OK吧；至少有二十万台湾人居住或工作在上海，还有不少台湾人居住在上海和苏州之间的走廊地带——这里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中心之一，正成为世界瞩目的新“硅谷”；上海一个重要的娱乐与房地产中心——“新天地”，主要由一个香港地产商投资。在那里，香港著名演员成龙是一个饭店的股东，而附近一个名叫“上海滩(Shanghai Tang)”的时装店则发端于一家来自香港的流行时装公司。作为新的电影中心，一方面是西方导演和制片人亲临上海拍片，如《面纱》和《碟中谍III》等；另一方面，也同来自香港、台湾的多位导演多次在上海市区或郊区拍摄以上海为背景的影片有关。如周星驰导演的《功夫》等。如果仔细观察和收集，这张可以说明上海如今“再全球化”特征的单子还能列得更长，并足以成为一个遐想未来上海的新起点。

超越对历史记忆的怀念

历史将持续推动上海突飞猛进。随着这个大都市继续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向前发展，人们对近代上海、今日上海的关注会逐渐增加。

当然，历史将持续推动上海突飞猛进。这一点在这个城市现下的旅游业发展上表现得格外鲜明。

至今，有些地方对某些群体仍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总有这么一批访客，兴致勃勃地回到他们年轻时曾在上海逗留过的地方，或者想看看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们曾居住过的地方，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或是曾在虹口区一带聚居的日本侨民，或是二战期间逃离纳粹迫害客居上海的犹太难民。

至今，在香港、伦敦、纽约、巴黎……那些曾生活在或访问过上海的父辈或祖父辈将故事代代传颂，以至于使得某些建筑物或某些回忆中的光景，在这些游客的童年时光中有着重要意义，或已成为他们家庭旧事中的主题。

历史带来了游客，也带来了投资者或生意人。许多居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因为个人或家庭与上海的关系而将生意带回了上海。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香港导演王家卫出生于上海，最近就开始在他的出生地开拍电影。

然而，历史，将并非上海继续塑造其未来的唯一因素。尽管“旧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几乎所有怀旧餐厅或咖啡吧的主题，也为众多商业广告乐于引用，但这并不是需要我们谨记的唯一一段历史。比如，上海的国际旅游业还依赖可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古迹。如在游览整个上海时，一般而言，豫园会被作为重要的一站。又如，对于一些访问上海或其他中国城市的外国游客而言，如果他们此行没有买到一些真的或仿制的毛泽东时代的纪念章或纪念物品，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地来过中国、体验过上海的生活。

当然，我们有理由期望，随着这个大都市继续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向前发展，人们对近代上海、今日上海的关注会逐渐增加。这种变化可以从本地书店中开始设立“老上海”柜台看出来。这样的柜台从前一般都只陈列有关通商时代的“老上海”的书籍，但现在关于较晚时期的出版物，如1956年的上海地图的重印版，也开始出现了。

这一初露端倪的新趋势将在随后的几年里更加明显。而能说明这一端倪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两本书的成功出版，即《变化中的上海》和《变化中的上海II》。

这两本书几乎没有文字，仅仅是将过去拍摄的本地街景的黑白照片与最近拍摄的、相同景色下的彩色照片并列放置。并列对照的这两张照片往往极为不同，比如常常可以看到，泥土街巷变成了多车道马路，低层建筑让位于摩天大楼等。除此之外，这两本书还有着两个特别之处：拍摄旧的和新的照片的摄影师是一对父子，父亲拍的是黑白照，儿子拍的是彩色照；书中黑白照片所表示的“从前”并不是指上世纪30年代，甚至也不是指50年代，而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有时甚至是指90年代初。

如今，走在“再全球化”之路上并谋求更高地位的城市还不止上海一个。例如，和上海一样，伊斯坦布尔也正在努力获得世界游客和投资者的注意，并设想自己将重新成为一百年前那样的国际大都市。这类城市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本地推动者表现出用历史换取未来的浓厚兴趣，以期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更应将视线投向将来。鉴于这个城市在利用其历史以满足其当下全球化目标方面取得的成功，我们期望看到这个城市能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曾有过同样辉煌历史的其他城市的榜样。印度的孟买就已经开始学习上海了。孟买的一些推动者认为上海开拓了一条可供他们效仿的发展道路。我们不难想象，上海对其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历史资源的利用，也可以成为其他一些具有国际雄心的城市仿效的模式。

独特而又充满未来感

上海是独特的，但又不尽如此。没有人知道，上海的下一场演出将是什么。只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上海的“蛋白质”将会持续变化。她作为未来之都的自我创造将不会停步。

比较不同城市通常是件棘手的事，因为每个城市都至少有一个或两个特点使其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有的城市历史独特，有的地理位置非同寻常，有的人口构成独树一帜。有的城市，其居民的习性和信仰、市政制度或其在地区贸易网络中的角色等，都可能独具特色。还有的城市则有着迥然不同的建筑风格、文化制度结构以及本地产业的基础特征等。最后，还有的城市，如上海，在以上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毫不令人奇怪，一直以来并且将来也会存在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上海是一个不容比较的城市。

这方面可供我们在此引用的评价有两个，发表时间彼此相距时间长达60年。一个出自《中国每周评论》的创始人兼编辑托马斯·米纳德（Thomas Millard），另一个则出自中国著名的上海研究专家张仲礼。

上海是多面的……在世界城市之林中独一无二……机会难以描述……

（Millard, 1928）

上海不同于伦敦或巴黎……她也不同于纽约……她甚至不像雅加达……上海的发展道路一直是独特的。上海就是上海。（Zhang, 1996）

不可否认，在很多具体的方面，上海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但为了了解上海的现状和未来，将其与其他地方相比较不无助益。另外，对于关注其他城市的人而言，思考上海是通过何种方式成为一个模式或成为其他城市可效仿的样板，也是有价值的。当然，毫无疑问，每一个城市都是独特的，并融各种特点于一身。无论她与其他城市有着怎样的共同点，无论她的社会构成是否将使人联

想到其他城市，更无论她是否与其他具有未来特征的城市有着如何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值得比较。

说到“未来特征”，将上海归入未来城市之列也是充满价值的思考。所谓“未来之城”，专指人们在试图了解这个世界究竟在向何处去时首先会去关注的地方、城市。巴黎和伦敦是 19 世纪的未来之城，纽约、东京和洛杉矶则在 20 世纪进入了该行列。现在迪拜和上海已列入未来城市之列，这从前述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数量上可以看出来。包括能在科幻影片中作为背景城市，也是表明该城市已进入未来之城行列的典型标志之一。最近，《洛杉矶时报》刊登了建筑评论家 Christopher Hawthorne 所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新一代‘超级城市’”的，其中伦敦、纽约和上海赫然在目。

然而，“未来之城”常常能激发梦想，但也能带来新的迷梦，而且其影响不仅仅在城内，而且还远及境外。她有可能不再被认为是城市之林中的奋起直追者，而是成为了其他城市的潮流引导者；她可能是一个举办世界博览会再理想不过的地方，被寄予厚望，并可能即将上演一场 21 世纪以来最高端的技术秀。因此，即便 Hawthorne 在文中强调了国际大都市“从国际金融到时装种种领域具有领先影响的特殊地位”，其分析也有很多独到之处，但这样的分析除了能为相关城市的推销者们带来不少舒心之感，未来需要脚踏实地地付出努力的地方还有太多。

对此，Ivan Szelenyi 所提供的分析框架相信对所有同时面对未来之“机遇”和未来之“困惑”的城市，都不无参考价值。Ivan Szelenyi 通过总结、归纳经典的都市理论资源，将“都市化”定义为一种能大致从以下三个方面“自我呈现”的现象：

第一，随着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说着各自的方言和语言，从事各种交易、信奉各自的宗教、烹饪不同的美食，在城市内部日益出现社会和文化上的异质化以及普遍常见的差异化。

第二，对于“边缘性”（marginality）的正面和负面表达都将增加。边缘性的正面表达指富于创造力而不受传统的约束。负面表达则指类似犯罪行为等可能带来负面的外部效应的行为、现象。例如，在一个全面的都市环境中，人们更自由，但未必像以往那样安全。

第三，城市对于空间，特别是在对中心区域空间或附近区域的使用进行管理时，将更倾向于作经济上的考量。

无论上海在未来能否真正成为举世公认的“未来之都”，以上三方面不妨作为一种经验，帮助分析、提供警示。

如同从前一样，上海仍然“仅此一个，别无同类”。她已经成为国际投资和游客的吸铁石，一个电影之都和贸易中心。

没有人知道，上海的下一场演出将是什么。只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上海的“蛋白质”将会持续变化，她作为未来之都的自我创造将不会停步。而立足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将能最好地理解这个城市。

（演讲时间：2009 年 3 月 12 日；本报有删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邓建国翻译、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校对。）

十一. 附录

2009 年度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

申报启事

学术工作坊 (work-shop) 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以下简称“高研院”) 在借鉴国际学术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建的一种新型学术建制, 其突出特色在于: 第一, 它以问题研究为导向, 摒弃以学科为分界的传统研究路径, 强调对某一特定问题的交叉学科或无学科研究; 第二, 学术工作坊旨在鼓励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强对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

为了更有效、更深入地推动中国深度研究, 从 2009 年开始, 我们特在工作坊中设立为期五年的“关键词”特别项目 (以下简称“关键词项目”)。该项目由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领衔, 以深入研究中国研究领域内的某些“关键词”的方式来推进对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经高研院学术委员会批准, 现发布 2009 年度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申报启事。

一、申报说明

1. 关键词项目分设“中国学术关键词研究”和“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学术关键词研究”两个学术工作坊, 均由邓正来教授领衔。每个工作坊每年由三名成员组成, 可以连续申报; 参与者独立开展对某个关键词的研究并协作讨论。

2. 申报对象为国内外所有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 (博士研究生、高校教师或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独立学者等), 不限职称和单位。申请者须从事与所选择的关键词相关的学术研究一年以上或有相关学术成果发表。

3. 申请者自行选择“关键词”, 并自行制定研究计划。所选择的“关键词”应当对中国研究具有全局性、综合性的价值, 对中国人的实际行为或制度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且属多个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比如说, “中国学术关键词”可选择 (但不限于) “面子”、“情理”、“关系”、“礼尚往来”等; “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学术关键词”可选择 (但不限于) “权利”、“自由”、“现代性”、“合法性”等 (关于“关键词”的选择或意义, 可参阅[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刘建基译, 三联书店 2005 年版和[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 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

4. 每个成员的研究期限为八个月, 并到高研院参加 2-3 次的学术讨论和交流 (费用由高研院承担)。研究结束时须按规定提交不少于 1 万字的工作论文 (working paper)。经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该论文可以推荐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发表, 并择优推荐给相关的英文出版物采用。

5. 每个成员资助科研经费 1.5 万元, 具体划拨与使用办法遵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执行。

6. 每个申请者限报一项同年度的高研院学术工作坊项目。

7. 其他未尽事宜由高研院解释。

二、评审与管理

关键词项目的评审坚持“学术平等、匿名评审、宁缺毋滥”的评审原则。

1. 评审分为初审和复审。高研院将首先邀请 5 位评审专家对课题申报进行双向匿名学术评审，确定复审入围名单。在此基础上，高研院将成立专门的学术工作坊答辩委员会，对进入复审名单的申请者进行现场答辩，经全体评委匿名投票后确定最终资助名单。

2. 获得基金资助的申请者应当遵照相关管理办法使用项目成果和资助资金。作品发表时，须在显著位置标注“邓正来教授主持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9 年度‘中国学术关键词研究’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学术关键词研究’学术工作坊项目”字样。

3. 申请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办理结项手续。

4. 《学术工作坊》负责人须与高研院签订“遵守学术规范合同”。如果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或结项后发现该项目研究存在学术失范或其他与管理规定相悖等问题，高研院将撤销该项目，并予以公示、追回资助资金。

三、申报程序

1. 在高研院（<http://www.ias.fudan.edu.cn>）网站下载填写“学术工作坊关键词特别项目申报表”和“关键词特别项目课题论证表”，按要求填写完毕后各打印 6 份，同时提供两名同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推荐信。

2. 电子版材料发送至 sunguodong0227@yahoo.cn（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申请关键词特别项目”）。

3. 纸面材料请邮寄至：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6 室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收（邮编：200433）。请在信封上注明“申请关键词特别项目”。

4. 申报截止日期为 2009 年 6 月 15 日。

咨询电话：（021）55665556（孙老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9 年 3 月 20 日